



捐款被“没收”隐喻的慈善生态

朱昌俊



京港澳高速南岗洼路段在暴雨中受灾严重,当晚有152名农民工在高速公路救出了上百名被困游客。此事经媒体报道后,慈善家李春平和腾讯筑德基金先后提供了30.4万元和15万元的赠款,表彰这些农民工见义勇为的行为。然而,部分参与救援的农民工表示,“钱确实发了,但是又收回去了,连发放的新毛巾被都被工地没收了”。(据8月9日《京华时报》)据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发布的消息,农民工被扣赠款已经全部退还。

到手的赠款被“没收”——与农民工暴雨夜自发救援,受邀参加崔永元等人的答谢宴,到公益基金和慈善个人对他们进行捐赠的温情故事相比而言,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局。

必须承认,工地对于农民工拿到捐款后可能提前解工,耽误工期的后果的预期,确实也是正常心理;甚至,还有个别人网友认为,100多名农民工同时参加救援,应该也离不开工地的支持和协助。所以,出于以上两种考虑,工地项目部对于捐款进行“暂时保管”似乎也具有正义

性。但这种推理所忽视的关键点是,上述现实的合理性完全是建立在一种背离慈善权利的基础上,于情于理都难以逃脱舆论的责难。

从捐赠方式来看,参与捐赠的慈善家和慈善基金会,选择直接作用于个人的发放形式,其实可能就存在着防止捐款被打折扣,不能全部流向农民工之手的目的考量;另一方面,这种方式也直接体现出,此次捐赠的收益人只能是这152名农民工。那么,在善款到达农民工个人手中之后,对于善款的支配权理应只存在于农民工个人,包括工地在内的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权对善款进行再次分配。肯定这种权利,也是对于捐助方慈善行动的必要尊重。毕竟,善款的最终走向其实也是捐助权利的一种延伸。

尽管工地“没收”善款一事遭遇了民工的不满,也被诉诸于媒体。但“没收”行为的顺利实现,也表明,农民工本身在对于善款的权利认定上不甚坚定,甚至不能将接受捐助明确为自己的应有权利。这与环卫工受捐后遭遇均分都有着同样的心理支撑。由此不难发现,中国慈善若要真正对接现代慈善理念,除了

消解权力逻辑在慈善上的支配权,对于公民的现代慈善观念和慈善权利的普及也不容忽视。

现代慈善理念强调“慈善是平民的权利”,这种权利一方面是公民的捐赠权,另一方面也是公民受捐助的权利。从中国慈善现状来看,长期以来官办慈善对于民间慈善的阻滞,以及配套制度的缺乏,不仅一定程度上阻塞了捐赠渠道的有效拓展,更影响到了公民的受捐助心理。当然,这起个案,还提示了另一种慈善软肋,即公民的权利困境同样会影响到受捐权利的实现。换句话说,本应无权利差异的慈善覆盖,却因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的差异而受到差异分配。可以说,实现慈善效力的真正抵达,公民基本权利的平等化也是必不可少的权利保障。

现代慈善理念认为,慈善并不是一种偶然性的社会现象,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“公共产品”。农民工的善款被“没收”的灰色剧情,折射的恰恰是这方面的认知的不足与权利无保障。以此揭示的中国慈善生态,当成为发展中国现代慈善的一个必要反切点。

W 微评论
weipinglun

禁谈“爆炸案” 是可笑的鸵鸟思维

从邓德勇、宋朝玉被正式宣布为云南巧家县“5·10”爆炸案嫌疑人时起,长时间成为谈资的爆炸案,现在成为“敏感”话题。8月7日,巧家警方来到爆炸案嫌犯邓德勇家叮嘱邓家人不要跟外人谈论案子,“外人”包括乡亲邻里和一切对案情感兴趣的人。多个信源证实,全县多数机关单位被要求“不评论、不传播、不议论”案件。有社区成员称,如果传出去,公职人员与党员会被处罚。(据8月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禁谈“爆炸案”,这不是可笑的鸵鸟思维吗?我们都知道,鸵鸟在躲避袭击时,通常会把头埋进沙里,以为没人看得见自己的身体。我们可以原谅低级动物的无知,但地方政府也学鸵鸟一样自欺欺人,就不免让人觉得有些欲盖弥彰了。

巧家县“5·10”爆炸案持续发酵,不断引发舆论高度关切,不是无缘无故的,无论是案发当时的故事,还是现在当地鸵鸟思维般的举动,都令民意大失所望。诚然,“以一个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来担保”已经大错特错,但如果能及时处置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,并及时回应舆情,积极诚恳互动,事件的负面、消极影响,还是可以降到最低程度的,当地政府及其官员的形象,还是可以挽回的。但是,当地政府并没有汲取这些教训,反而严令禁谈爆炸案,悍然以公权力再次错上加错,又让人们见识了一回可笑的鸵鸟思维。

真诚回应社会关切,积极提振政府公信,是每个党政干部的政治责任。可惜而可叹的是,像巧家县禁谈爆炸案这样的鸵鸟思维,并不是这么一个地方的“专利”,在很多突发事件里,我们都领教了此类损伤政府公信的举动。公安部原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曾说“让媒体说话,天塌不下来”,难道,让民众说话,天就会塌下来吗? 吴杭民

鱼贩“被逼自杀” 给普法工作的警示

8月7日,湖南鱼贩王培军喝农药自杀。此前,他与一辆三轮车发生刮擦事故,三轮车主跳车时致一名83岁老太摔倒。王培军在扶起老人后,将其送到医院检查,当时老太身体无恙。王培军妻子称之后他曾被老太家属反复索赔,金额由数千元升至20万。但老太家属否认索赔20万。(本报今日13版)

事实上,老太被撞即便真是王培军所为,事件双方也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为自己维权。只要相关法律条文能得到最大限度地执行,相信王培军也会收获应有的正义。可遗憾的是,底层社会的法律常识是如此匮乏,使得王培军一次次“妥协”,当最后在“无望”时,便选择了告别这个世界。可以说,不懂得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,这才是王培军自杀悲剧的本质原因。

另一方面,王培军之死,当地派出所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经当地派出所调解,王培军先后付出一万多元的代价,可得到的不是“结束”而是“无底洞”式的“过分要求”,无论这种“过分要求”到底来自于谁,民警都应提醒王培军拿起法律武器维权,而不是和这种无理要求继续纠缠。可惜,相关民警显然没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

被救的老太太愿将仇报,鱼贩法律维权意识不强,执法者的工作态度偏偏也是浮皮潦草,在这三者的共同作用下,王培军终于走上了自戕之路。面对这起悲剧,我们绝不该仅仅停留在道德评判上,更应明白全民普法工作的迫切和重要。 龙敏飞

F 非常道 feichangdao

S 时事乱炖 shishiluan dun

“强制办证”

“如果他们不交利润,那就该狠狠地收他们的税。”

——经济学家茅于軾在专栏文章中表示,在国有经济条件下,企业交税是没有意义的。因为企业的税和利润都是国家的,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区别。税收的前提是财产的私有,在私有财产受到严格保护的前提下,税其实是“购买”政府服务所花的钱。而对于如今国有企业该交的是税还是利润,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。不过,在中国公有制的企业几乎从来没有上交过利润。

“企业获得了利润,政府获得了税收,受直接影响的居民却被忽视。这直接导致了民众对高污染企业的敌视。”

——学者傅蔚冈认为,正是因为缺乏迁徙自由,用脚投票的居民无法在本地获得和本地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,因此他们面对的唯一一条道路就是在本地和政府死磕,今后任何一个高污染项目的落地,都将遇到类似抵抗。

8月6日晚,东莞塘厦镇逛街的路人被治安队员拦下检查居住证,近百名路人被带走交15元办证后才获准离开。负责人承认确有其事但否认强拉路人到警务室,称是宣传一下办证的好处。律师称治安队无执法权,强行控制流动人口办证不合理,并有非法侵害人身自由的嫌疑。(据8月9日《新快报》)

没有执法权的治安队员,居然强行拉人办理居住证,事后治保主任称只是“让他们到治安队登记一下,给他们宣传教育一下办居住证的好处。”既然是宣传,为何不交钱“办证”就不让离开?难道有一种宣传叫“强制办证”吗?

当地警方回应并没有民警参与此事,那么请问没有授权他们真敢如此大胆蛮干?公安机关作为治安队管理部门,就算没有授权,那也难免管理不严之责。按照程序,办居住证都是先到指定照相馆照完相,然后由照相馆拿回执证明,然后再到办证部门办证。现在却是交了钱才放人,而且没有收据,也不透露具体的照相馆,这样的程序颠倒所收的15块钱中是否存在猫腻



值得追问。

居住证的推出是为方便人口管理,均衡城市资源分配,居住证年限可以累加积分入户,还能享受城市公共医疗、教育、就业培训等优惠的权利,一项充满善意的政策却在如此粗暴野蛮的执行中被扭曲、丑化。就算是为了完成任务搞突击运动,那也不能不遵守政策法规,这已不止是工作方式方法有问题,而是侵犯了人身自由,是对公众权益的一种漠视和践踏。

邱发平/文 赵顺清/图

S 时评 shiping

官太太“吃空饷”背后的三重原因

黄栀梓

“这次学校改革,一次解聘了59名老师,但没想到曾连续3年吃空饷的县教育局局长的老婆还能留在学校,我们却被解聘了。”昨日,延长县二中33名教师签名向本报反映,他们认为,学校重新竞聘上岗存在很多不合理。(据8月9日《华商报》)

陕西延长县二中59名教师因生源减少被解聘,而吃了3年空饷的县教育局局长老婆却依然“稳坐钓鱼台”,恐怕不只是个例而是官太太“吃空饷”现象的一个缩影。笔者分析认为,在官太太“吃空饷”现象普遍存在的背后有三重原因。

一是官员滥权。从主观上看,官太太“吃空饷”的背后,是某些官员滥用职权使

然。正所谓“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。”某些官员一旦登上了权力宝座后,首先并不是想着如何运用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为人民服务,而是考虑如何玩权弄权为个人、亲属、家庭、家族谋取私利,先让自己的老婆吃上安稳的“皇粮”当然是首当其冲的了。

二是下属媚权。在某些地方,官太太往往成为一些下属单位争抢的“香饽饽”,只要“抢”到了官太太这个“香饽饽”,也就等于打开单位及其领导办事的方便之门,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,登门拜访上司至少不会被堵在门外吃“闭门羹”,至于官太太被“抢”到单位后,上不上班,干不干活自然是无关紧要的。

三是查处畏权。清理整治“吃空饷”的

行动曾经在很多地方大规模地进行,但对面“吃空饷”的官太太却不得不“睁只眼闭只眼”,或是以领导在外边工作辛苦顾不上家,家里需要官太太照顾为由,或是看在官太太为单位办事提供了诸多便利,做出了一般人难以做出的“贡献”的份上,对官太太“吃空饷”网开一面,得过且过。

由此可见,要想根治官太太“吃空饷”,还须加大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力,以规范官员用权行为,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人事管理、工资发放的透明度,以满足公众对官员家属工作状况的知情权和监督权,将官太太“吃空饷”纳入公众监督的视野,从而受到应有的制约。